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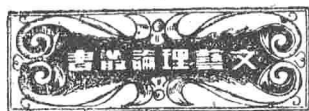
6.6

論中學人的民性

著 蘇 · 顧 爾 希 坦
譯 戈 寶 權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論文的中學人性

著 蘇·顧爾希坦

譯 戈 寶 權

海 洋 書 屋 刊 行

1947



論文學中的人性

著者 蘇·顧爾希坦

譯者 戈寶權

發行所 海洋書屋

香港堅道一三五號地下

總經售 大眾書店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五月再版

2001—5000

論中國文學革命

論文學中的人民性(蘇·顧爾希坦)

生活與美學(俄·車爾尼雪夫斯基)

論人民的文學

瞿秋白著

戈寶權譯

周揚譯

馮乃超著

目次

譯者序.....

一、里夫希茲們的混亂和錯誤的觀念.....

二、「人民性」這個概念的歷史性的問題.....

三、「什麼是人民性」？.....

四、人民性與階級性.....

五、人民性的內容與尺度.....

六、怎樣才能正確地瞭解人民性這個概念.....

七、談各種曲解形式的人民性.....

八、論新的社會主義的人民性.....

五一

四五

三九

三三

二七

一七

一三

七

一

譯者序

爲了弄清這篇譯文的紛繁的頭緒起見，不得不概括的講一講一九四〇年蘇聯文壇上的一次論戰，因爲顧爾希坦的這篇文章，是在這次論戰之後寫的，並且是針對着這次論戰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文學中的人民性。

一九四〇年的一月到四月間，蘇聯的許多文藝批評家們，曾在『文學報』上展開了一個很大的論戰。參加這次論戰的：一方面是受到最嚴格批評的所謂『文學批評』（雜誌名）派的宗派集團，另一方面就是蘇聯的其他許多批評家們（其中包括克尼波維奇、阿爾特曼、吉爾波丁等許多人）。『文學批評』派這個宗派集團的主要人物，就有盧卡契、里夫西茲、格里布、烏希愛維奇、亞力山德羅夫、凱曼諾夫、瓦爾茲曼等許多人，『文學評論』的主編F·萊文，也屬於這個集團的。

這次論戰是這樣發生的：一九三九年時，批評家盧卡契出版的一本『論現實主義的歷史』，在這本書裏面，作者對於文學原理和文學史的問題犯了一些錯誤的見解。因此批評家克尼波維奇就在當年『國際文學』俄文版的十一月號和十一月十五日的『文學報』上，發表了批評這本書及指摘其錯誤的文字。在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後，盧卡契不但沒有接受批評和承認錯誤，而『文學批評雜誌』

的另一位批評家同時又是盧卡契這本書的編者里夫西茲，却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的『文學報』上發表了一篇題名為『厭倦了』的文字，一方面想掩飾盧卡契的錯誤，把問題拖到一邊去；一方面他本人在這篇文章裡又犯了一些新的更嚴重的錯誤。從此就可以看出：盧卡契和里夫西茲們是同屬一個系統的。在作家協會所舉行的批評家會議席上，萊文更公開地聲明自己是整個『思潮派』的代表，而這個派別就是以團結在『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兩種雜誌週圍的人為基礎的；盧卡契甚至在某處地方還曾說過，他們的理論是一種『路線』。他們這些人，對同派人的作品稱譽備至，對自己的集團的錯誤則拼命地袒護，而在文壇上形成了一個狹隘的、有害的、和馬克斯主義批評家相對立的宗派集團。

從這個論戰開展之後，在蘇聯的『文學報』上經常闢有『文學論戰欄』刊載雙方文字，這樣直到『紅色的處女地』（文學雜誌名）發表了批評家阿爾特曼的『文藝論戰』和該雜誌編輯部所寫的『論「文藝批評」雜誌的有害觀點』等文字，以及當年十二月八日『文學報』發表了『批評與文學』社論之後，才告一個結束。（『紅色處女地』上面的文字，曾譯載一九四〇年『中蘇文化』的十月革命二十三週年紀念特刊和一九四一年的『中蘇文化』的文藝特刊上，可供參考）。

阿爾特曼說過：『里夫西茲和盧卡契的集團，無論在歷史問題上，無論在理論問題上（世界觀與創作），無論在具體的文藝問題上（創作的人民性，對作家創作的估計等等），都是曲解馬列主

義的。這個集團到處所用的基本「方法」，就是「超階級的」的客觀主義、反歷史主義、理論與實際脫節，以及忽視社會主義文藝的迫切問題等」。他們在文藝理論上所犯的幾個重要的錯誤觀點，就是：（一）用「人民」和「人民性」這些抽象的概念，來代替階級的具體分析和階級性與階級鬥爭的許多觀點。（二）他們想出了藝術是和人類物質文化發展的過程成反比例的「定律」，來代替

馬克思主義關於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關係及文化發展的學說。（三）他們企圖證明出藝術家的反動的保守的世界觀和偏見，是創造優秀的藝術作品的良好基礎。此外他們在關於蘇聯文學的估計和評價上，也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現在我只就第一點來簡括地談一談：列寧老早就要求大家，不要用「人民」這個字來掩飾人民中間和階級性的階級對立現實，而里夫西茲和盧卡契們的這個派別，正是這樣做的，他們用「人民」的字樣，代替了「階級」的字樣。他們放棄了階級的分析，甚至還曲解和濫用了「人民性」這個概念，說普希金是「人民的作家」，莎士比亞也是「人民的作家」，舉凡一切的作家，都變成「人民的作家」了。至於什麼是「人民性」的要求呢？雷赫在「文藝論爭的幾個教訓」（此文有蘇凡的中譯，載一九四一年「中蘇文化」文藝專號中）一文中說得很清楚：「人民的第一個條件，是相信勞動大眾，愛人民，正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那樣地愛人民，正像斯大林那樣地愛人民。這種愛使得他們能通過偏見的積層，看到大民的天才創造力。爲了要使得人民性這個字義真正成爲人民的，就必須知道人類歷史，和瞭解社會生活發展的法則，就必須瞭解怎

樣爲資本主義社會所限制而造成的貧困、無權、和道德上及精神上的解體，就必須準備工人階級經由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去結束人壓迫人和人剝削人的現象。明瞭先進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問題的本質。但是盧卡契和里夫希茲正好放棄了這些意見。他們忘掉了階級性的概念，忘掉了作家和作品的階級分析。他們不知道統治階層正用偏見來傳染勞動人民，更不懂得人民作家的任務在於思想上引導人民鬥爭、前進」。

蘇聯的另一位批評家 A·顧爾希坦更專就「人民性」這個問題，寫了一篇很長的文字，發表在一九四〇年七月號的「新世界」文藝雜誌中，闡述了這個問題許多細節，並引了許多俄國作家和外國作家的作品來做例證。一九四一年時，顧爾希坦又將這篇文章大加擴充，編進了他所寫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諸問題」一書中去（此書係列爲蘇聯國家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院的研究論著之一，一九四一年莫斯科「蘇維埃作家」出版局版）現在譯者所根據的，就是後一種原文。此文全文共八大段，首先指出了里夫希茲的錯誤觀念，繼而即就人民性，人民性與階級分析，人民性與現實主義等許多問題來加以立論，當我們現在大家討論作家與作品的群眾觀點的問題時，特將此文譯出，以供大家作爲研究和參考之用。同時原文艱深，翻譯不易；引証與用典又多，不能一一詳加解釋，尙望讀者原諒。

最後講到「人民性」這個名詞在俄文中是 *Narodnost*，係自「人民」(*Narod*) 一字而來。這

個名詞在字典中又有國風，國民性、民風、人民主義等解釋；在已有的中文譯名中，則有人譯爲『通俗性』和『民族性』，但與原意俱不能確切吻合。過去蘇凡曾將這個名詞譯爲『人民性』，我和幾位朋友談過，也主張『人民性』一名詞較爲確當，所以現在就沿用這個譯名了。

「從某個時候起，講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文學作品中缺乏人民性，已經成了我們大家的習慣，——但從沒有一個人想來下一個定義，他究竟是怎樣理解人民性這個名詞的」。

這樣的一段話，是普式庚在一百多年的一八二五年所寫的。這幾句話，在某種程度上，一直到今天還保有着它的效用。我們現在也常常講人民性，向我們的作家們提出人民性的要求，但是我們目前嵌進這個要求的，却是各種最不同的內容，我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地是想確定出人民性這個概念的內容，並且從這個觀點，提出一些面迎在我們蘇聯文學前面的任務。

一 里夫希茲們的混亂和錯誤的觀念

我們現在最好是先從論辯來開頭。這是一個很好的習慣，我們的導師——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們，是喜觀借助於這個方法的，因為在和虛偽的及不正確的學說所作的爭論中，你就能清除出一條確定真理的途徑。

不久以前，在我們的文藝科學和批評中，所謂庸俗的社會學，曾經自以為很自滿的，並且差不多是以主人的姿態自居了。在它的那一套理論當中「人民」和「人民的」這些概念，是完全沒有地位的；這是些被禁的字，因為這些字的聲音會引起一陣不安和虔敬的戰慄，事實上我們大家都知

道，在凡是和人民，和人民性相聯繫着的事物中，可以感覺到一種活躍的生命的氣息；可是屬於『Sociologus vulgaris』（『庸俗社會學』）這一種血族的禁慾主義者和富有憂鬱感的公式主義者，是最害怕生活的。他們自以爲是『階級分析』的騎士，但是他們却喜歡按照他們想像出的階級集團與小集團的分劃，將具有着生動的富源、多樣性、複雜性以及常常是包含着矛盾內容的各種文藝現象之真正馬列主義的分析，作出一個極簡單的分類。作階級的分析，就是求我們在思想上加工，就要求我們須具備有生活與歷史的知識，就要求能用辯證的方法來看各種現象；凡是『分類法』愈簡單，則這種方法的擁護者的生活一定也是浮表而不是深思熟慮的。關於作家的分類，他們是有着各種現成的標誌：貴族的作家、小貴族（指土地少和農奴少的人而言——譯者）的作家、上升的與下降的資產階級的作家；一個文藝科學研究者的任務，就僅僅在於挑選出這種標誌，並且把這種標誌貼在作家創作的所有進口和出口上；他們之所以要這樣貼起來，就是要使得清鮮的空氣、思想與生命的氣息都無法透入。

我們的庸俗社會學，是已經被粉碎了。但是代之而起的，却出現了另一批新學說的倡行者，他們拿新的公式主義來和庸俗的社會學者們的公式主義對立起來，這種新的公式主義又帶有另一種性質，但並不因此就少庸俗一些。爲了代替庸俗的社會學者們所使用的那一大套比較上可供自由選擇的標誌，這批新學說的倡行者，就拿出一種普遍的可用於過去所有作家的身上的標誌；這個標誌就

是：人民的作家。這種新學說，有條件地可以稱爲是種「新民粹主義」的學說，它同樣地也證實了它的倡行者們的浮表和淺薄的存在。各種文學與藝術現象的全部複雜性與矛盾性，對於他們，也正像對於庸俗的社會學者們一樣，是並不存在的。他們寫他們自己的「大作」時，也正像庸俗社會學者們一樣，是帶有憂鬱感，但是還是冷淡不關心。他們正像掘墓者一樣，用着一種平衡過的冷漠的態度，來看過去的一切巨匠，和有時候來看次等的匠師：因爲在走進了代表着公理與普遍的坦白性的永恆之門時，一切都是同樣平等的。因此，過去所有的作家就都被平衡過，這些作家開始互相相像，也分別不開了。所有這些作家——都是「人民的」。他們的這種辦法，甚至達到這樣一個笑話的程度，聽說在某一篇考學位的論文中，竟有人用着嚴正的態度來証明科考爾尼克（註一）的「人民性」（根據伏赫特同志的論証）。「人民的」這個字，已成了一個魔術似的字眼，已成了我們批評界的一個符咒，一句「開門的暗語」（註二）。我們到處都可以碰到它的。由於他們這樣頻繁地應用和誤用的原故，「人民性」和「人民的」這兩個字，已抹煞了和喪失了它本身的存在和它的原有的內容了。

這些新學說的倡行者是誰呢？他們的名字是集體的。請你讀一讀他們所寫的堆積如山的紀念論文吧，在這些文章的作者中間，你一定會找到此地所講的人。庸俗主義者是善於把他們所接觸到一切事物都弄成卑劣，——他們甚至把我們國家所制定的紀念過去偉大巨匠們的美好的習慣，和指引

着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文化遺產的習慣，也同樣地弄成卑劣的了。

但是我們也找到一些學者式的批評家們，他們想把「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應用到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學說中去。在這些學者式的批評家中，毫無爭論地，首席應該是歸於里夫希茲，他早已就僭望「導師」這個稱號了。他把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出版的第一部著作，視爲是「表現出馬克思對於整個歷史發展過程的各種觀點的一個嘗試，而他所從而出發的那一方面，是直到目前爲止還從沒有人敘述過的」（里夫希茲：『藝術與哲學諸問題』，俄文本一九三五年版第一五六頁）。里夫希茲同志在馬克思主義的部門裏是這樣的一位「革新者」（因爲在他以前還「從沒有人曾經給馬克思的學說作過全面的敘述」）。自然地，他就作出了一大類的連馬克思主義者們都還不知道的「發現」。庸俗社會學曾經真正地用粗野的方式歪曲了階級分析的概念，而現在里希茲夫同志在反對庸俗社會學的鬥爭的形式之下，實質上提出了完全放棄文學中的階級分析。他懷疑了階級本身的存在；他甚至講出了這樣的話，說在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至一九〇五年的（就是直到我們大革命的「總預演」的這一年）俄國現實中，階級的成份上，階級的結構上，好像是沒有什麼明確的界綫，照他的說法，當時存在着的，是「客觀的階級混亂」（里夫希茲同志的這個驚人的「發現」，是發表在他所寫的『列寧主義與藝術批評』一篇綱領式的長文中，見一九三六年第四期『文學報』）。這就是他們的說法！

講到「階級的混亂」，里夫希茲同志就想爲這個在思想上本身有着難以使人信服的混亂，找到一個理論上的辯護的解釋；而這種混亂，被稱爲是種「新學說」的。里夫希茲同志把階級的性質，歸之於「主觀的帶色彩的看法」。一旦既然沒有了階級，自然，就用不着再來談什麼階級分析了；這種即興的打諢的插白，在本質上，是響在自由主義文學理論中的許多古老的美好的諧調的廉價的再版。我們現在謹祝文學批評上的這種即興的打諢插白萬歲！至於這種發現究竟帶給舊調的信奉者以多麼巨大的喜悅，那是用不着說了，他們在新的「變動」中，找到了一種恩赦，一種能讓他們向後退的允許。

里夫希茲同志的戰友們和追隨者們，就開始以各種儘可能的方法來使用「人民」這個字，並且用斜體字印出來。（印刷中用斜體字，以示注目——譯者）（註三）。凱慢諾夫同志說莎士比亞是位英國的人民詩人，並且他還真誠地想說服人家，他這種說法是最終地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家的任務。在各種雜誌上，開始出現了許多建立在這種新的雛型上的論文。舊的文章都趕快地被改了面目：凡是從前用「階級」這個字的地方，現在都出現了「人民」這個字樣。排字工人是很容易做好這個改字的工作的，他用不着怕字數會超出了原有的地位，因爲這兩個名詞的字數，都是同樣的（註四）。

在這種「新民粹主義」的水流中，還有着某種足以慰藉人的新東西。第一，這是對於庸俗社會

學的可憐的命運的一個反動。第二，就是在這個雖然被歪曲得很利害的形式裏，還有着我們現實的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過程的反映，這種過程創造了團結的蘇維埃人民，並且喚醒大家要從人民群眾的觀點，來重看過去的人民羣衆參加過的歷史。但是，我們要在此地重覆一句，就是這種過程在他們所製定出的這種『學說』的原則下，是得到一種被歪曲得很利害的反映。他們在此地還作了一個企圖，機械地把各種新的階級的相互關係引用到舊的事情上去，而這些新的階級的相互關係，在我們國家之所以能建立起來，是由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全改建了我們國家的整個階級結構，並且使得我們的國家變成爲社會主義底國家的勝利的結果而成的。里夫希茲同志及其戰友們的意見，是深深地反歷史的。現在我們想把這些被移動過的歷史事實，重新歸還它們的原位。

二 「人民」 這個概念的歷史性的問題

在解剖「人民性」這個概念時，我們最先解剖一個原則，——這就是「人民性」這個概念的歷史性的原則，「人民性」這個概念，一方面是隨着歷史的真正的現實的改變而改變的，另一方面則隨着這個概念所透過的那個歷史的分光鏡而改變的。每一個文學的派別，每一種文學的理論，每一種文體的學說，都有它自己的人民性的理論，都有它自己的人民性的法典。

「人民性」這個概念本身，在文學中出現還是比較不久的事；它的根源應該在文藝復興的時期中尋覓出來，因為這時候，歐洲各國民族文學發展的問題，正被特別尖銳地提出來。在十八世紀時，人民的創造，其本身已成爲當時的以及事後造成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許多偉大社會變革的一個後果，因此隨着當時對於人民的創造的興趣的增長，——「人民」和「人民的」這些字眼，在文學的論著中就開始更加被確定了。

在我們國家裏，第一個尖銳地提出藝術中的人民性這個問題的人，就是十八世紀的一位卓越的俄國啓蒙學者——拉地謝夫（註五）

這個概念的發生，証明出大家對於這個指明出的現象的正在成熟着的興趣，同樣地，也証明出